

## 古涑水湖与雷泽的地理文献互证

□杨洪惠

近日,《运城晚报》刊发的《古涑水湖与河东远古圣湖雷泽考》(作者李波)一文,引发关注。该研究以地理实证与文献互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论证了永济虞乡镇青龙峪一带作为华胥故地的历史可能性,不仅为传说时代的地理考证提供了新范式,也为河东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补充了关键依据。

## 自然条件与文献记载的统一

中条山北麓的古涑水湖,经地质与历史地理研究证实,曾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淡水湖泊,其范围覆盖今永济市一带。这一地理实体与《史记·五帝本纪》中“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所记载的“雷泽”在区位、形态与存续时间上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雷泽在先秦文献中多次被提及为华胥、伏羲与舜帝活动的关键地理坐标,而古涑水湖恰处于中条山与涑水河交汇的冲积扇前缘,形成山前湖盆结构,符合早期人类逐水而居的生存逻辑。

虞乡青龙峪不仅毗邻古湖,其自身地貌亦具备远古部落栖居的理想条件:

天然洞穴可提供居住与遮蔽,中条山南麓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可支撑采集与渔猎,湖泽则提供稳定的水源与鱼类补给。这种“山-水-原”三位一体的生态格局,正是新石器时代聚落选址的典型特征,从而在自然条件层面为华胥部落的存在奠定了物质基础。

## 从先秦经典到地方志的记载

关于雷泽与华胥、舜的关联,早期文献记载系统而连贯。《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虽具神话色彩,却暗示该泽在远古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史记》进一步将雷泽与华胥、舜相联系,构建起圣王传说的地理依托。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确记载涑水“西经雷泽,泽东南有舜井”,不仅将雷泽定位在涑水流域,亦与虞舜遗迹形成空间关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方志的继承与细化。《蒲州府志》直接标注“雷泽在雷首山下”,雷首山即中条山西段,与古涑水湖位置基本吻合。方志在承袭前代地理认知的同时,亦融入地方记忆与实地考证,使雷泽的地理指向从文本走向具体山水,

形成从先秦至近代的文献证据链。

## 物质遗存与民俗记忆的实证

古湖消亡后留下的地质与生态痕迹,成为可触摸的实物证据。虞乡周边分布的大面积盐碱地,正是古涑水湖水体蒸发、盐分积淀的自然结果,这类地质遗存与文献中“雷泽广衍,水草丰沛”的描述可相互印证。此外,青龙峪所在区域曾发掘出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陶器、石器、石器等遗物表明该地存在持续的史前人类活动。

民俗传承则提供了另一重活态证据。虞乡境内现存“华胥峰”地名,地方至今延续着恭祭华胥圣母的庙会与典礼。这类民俗活动并非晚近生成,而是深植于地方祭祀传统,反映了对远古母系始祖的地方历史记忆。人类学研究显示,圣王传说往往与特定山川祭祀结合,形成“地-人-神”互嵌的文化景观,虞乡的民俗实践正可视作这一过程的当代延续。

## 文明演进逻辑的闭环

从文明发展的时间维度看,古涑水湖作为稳定的大型淡水湖泊,其存续期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至夏商之际,

这与华胥至舜帝传说的年代跨度(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2000年)大致对应。雷泽并非短暂水域,而是持续影响周边人文发展的地理常量,从而能够承载长达数千年的传说累积与历史叙事。

与此同时,湖泽周边分布的早期城邑遗址,如解梁城、虞舜古城等,构成一个围绕古湖的聚落群。这种“大湖+卫星聚落”的空间结构,符合早期文明“沿水发展、向心聚集”的演进模式。青龙峪位于该区域的地理中心,兼具山峪防御与湖泽资源之利,很可能曾是这一聚落系统的核心区域之一。

李波老师的研究,通过整合地理考证、文献梳理、遗存分析与民俗考察,将古涑水湖(雷泽)从传说意象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地理实体,进而为“华胥故地在虞乡青龙峪”的论点构建起多层证据体系。这一论证不仅弥补了河东史前地理研究的一段空白,更从“山水-部落-文明”互动视角,揭示了华夏早期文明在中条山-涑水河区域生成的自然与人文基础。青龙峪因此不再仅仅是地方传说中的文化符号,而成为理解华夏文明起源阶段人地关系的一个重要地理坐标与实物样本,进一步巩固了河东作为“华夏根祖文化核心区”的历史地位。

锚定文化使命 共谋发展新篇  
全市文联工作会议举行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1月9日,2026年全市文联工作会议在市文联举行(上图)。会议深入学习上级重要会议精神与市委工作要求,凝聚全市文艺力量赋能文化强市建设。市文联机关全体人员,所属文艺家协(学)会主席团、文艺骨干代表,各县(市、区)文联相关负责人100余人参加。

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重点传达学习了市委主要领导参观文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时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意见。

会议提出,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市委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讲政治、讲法治、讲修身、讲修为,关注现实,潜心创作,繁荣文艺事业,赋能城市发展。要在深耕本土文化上下功夫,注重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让文艺作品始终带着运城的“文化基因”和“地域标识”;要在主题活动策划和文艺

精品创作上下功夫,既传承传统艺术精髓,又融入现代审美理念和数字技术,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要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上下功夫,主动对接全市文旅发展大局,真正让文艺作品成为展示运城形象的“窗口”、吸引游客的“名片”、带动产业的“引擎”,实现文艺价值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推动我市“一城两区三门户”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在随后召开的全市文联系统座谈会上,各县(市、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还围绕本地文艺工作实践、品牌建设、人才培养等展开交流座谈,总结2025年工作、谋划2026年发展,探讨当前文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会议强调文艺育人、文艺育商、文艺育风、文艺育绿的重要性,就建立文艺人才梯次培养机制、加强区域文艺交流、深化文艺惠民服务、创作河东特色文化品牌等达成共识,为全市文联工作协同推进凝聚了合力。

## 从不内耗的刘禹锡

□冯俊红

说起不内耗,古往今来,文人骚客中唐河中府宝鼎(今万荣县)薛謩的女婿刘禹锡毫无悬念地排在前列。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19岁的刘禹锡离开家乡嘉兴到长安游学。当时的长安刚刚经历战乱不久,民不聊生。刘禹锡目睹民生疾苦,当即上书朝廷,希望朝廷体恤百姓,有所作为。“弱冠游成京,上书金马外”,初生牛犊的他不畏皇权,勇于进谏。虽未被采纳,但这番举措彰显了他小小年纪遵从本心、忧国忧民、济怀天下、爱抚苍生的远大抱负。793年,21岁的刘禹锡连登三科,进士及第。少年有成、博学多才、扬名天下的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谓人生的巅峰!

然好景不长,只因追随王叔文等人参与永贞革新,便被扣上“朋党”的帽子,贬为朗州司马。

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在大唐可是蛮荒之地,刘禹锡却在此地一住十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一反常态,打破了世人悲秋的惯常,他笔下的秋如同春朝蓬勃向上,高远辽阔。他就是晴空一鹤,万丈凌云,展翅高飞!越是逆境,越要豪情万丈!全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感觉,更是诗人乐观自信的体现和博大胸襟的真实写照。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被召还京。玄都观里桃花正盛,游人如织。离京十载,物是人非,他遂作:“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处桃花暗指刘禹锡被贬之后朝廷扶植的新贵们,看花人实指当朝趋炎附势之人。

刘禹锡十年后重回朝廷,面对朝野新贵和趋炎附势之徒,冷眼相看。你们莫要张

狂,也不过我离开之后,尔等才权倾朝野的。这首诗体现了诗人不畏强权,不惧权贵,刚直不阿的品格。

也正因为此诗,刘禹锡再次被贬,先贬为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刺史,后又贬为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一带)刺史。

刘禹锡到任夔州后,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竹枝词》就是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写出来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后一句一语双关,既写天气阴晴不定,又把少女的怦然心动、欲语还休的羞涩状态描摹而出,含蓄而隽永。从诗中不难看出,诗人亲民爱民的深厚情怀,以及他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的本心。

公元826年,刘禹锡奉旨调回洛阳,北归途中,在扬州与好友白居易重逢。筵席上白居易作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感慨刘禹锡的坎坷,刘禹锡挥笔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为回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被贬二十三载,若是常人早已万念俱灰,但刘禹锡岂是泛泛之辈?

诗人以“沉舟、病树”自喻,坦然面对自身老去,半生坎坷的现实。他不怨天尤人,清醒而自知。“千帆过、万木春”新生事物必将取代陈旧事物,这是自然规律不必伤怀!他从绝境中看到希望和前景,停止内耗,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生活。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有过名噪天下的高光时刻,更多的却是被贬之后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无论是哪种境遇,他都能泰然自若,应对自如。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一篇篇惊世名作,更是一笔淡然处世、活出本我、从不内耗的精神财富,这份通透与豁达,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传承!